

伊拉克战争前后 土耳其与美国、欧盟关系 的发展变化

汪 波

内容提要 土美关系与土欧关系是土耳其对外关系中两根最重要的支柱。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建立在双方互利基础上的土美关系发展相对稳定,且是推动以加入欧盟为土耳其现阶段首要目标的土欧关系的重要促进因素。伊拉克战争中土美关系出现隔阂,导致土美关系和土欧关系内在的相互促进关系被打破。战后,土耳其努力修补与美国关系的裂痕,力图在美欧关系调整变化的过程中,通过土美关系与土欧关系的相互促进来加快其加入欧盟的进程。

关键词 土耳其 土美关系 土欧关系 伊拉克战争

作者简介 汪波,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083)。

在土耳其对外关系中,与美国关系和与欧盟关系是两根相互联系的重要支柱。相比之下,土美关系建立在双方利益相互需求之上,多年来相对稳定。冷战时期,土耳其在北约中占据重要地位,是美国的重要盟国之一。海湾危机中,土耳其在美国军事介入中东时继续发挥了重要作用。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在推行全球性反恐战略的过程中,依然需要土耳其提供军事战略上的便利。土耳其作为伊斯兰世界中世俗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多年来得到了美国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大力支持,得以维护其地区性大国地位。因此,土美关系长期以来保持着一种相互倚重的稳定状态。而土耳其与欧盟之间关系的性质与利益要素则有所不同。土耳其为了彻底改变落后的经济地位和成为一个完全欧洲化国家,一直积极致力于加入欧盟。但由于土耳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和差距,欧洲方面对于土耳其加入欧盟的问题一直拖延未决。从20世纪60年代到伊拉克战争爆发,土耳其经常依靠美国对欧洲国家施加影响来推动它加入欧盟的进程。伊拉克

战争爆发后土美关系出现的裂痕,打破了土耳其与美欧之间原来的关系模式。伊拉克战争结束后,土耳其又开始积极致力于重新平衡与美欧的关系,以维护和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

伊拉克战争爆发前 土耳其与美欧的关系

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土耳其与美国、欧盟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借助相对稳定的土美关系来促进土欧关系的发展,以实现土耳其的欧洲梦。作为一个跨欧亚大陆的国家,土耳其长期追求成为一个被欧洲认同的欧洲化国家。因此,土耳其与欧洲关系的发展始终和土耳其加入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密切相关。土耳其的欧洲情结可以追溯到奥斯曼帝国时代,其欧洲化道路充满曲折。早在1963年,土耳其就和欧共体签订过合作协议。但考虑到土耳其的国土面积、经济发展水平、民主化程度,以及穆斯林占主导地位等现实情况,欧盟方面对土耳其的入盟要求一直拖延

不决。^①同时,土耳其加入欧盟进程迟缓还涉及一些具体原因。首先,土耳其在塞浦路斯问题上和希腊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致使希腊自 1999 年一直坚持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其次,土耳其虽然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建立了民主体制,并被视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二次民主化浪潮中的典型,但土耳其在 1987 年正式申请加入欧共体时面对的却是一个改变了的欧洲。“新欧洲”更加重视民主的质量,以及国家对公民权利和人权的重视。^②而如果按照“实质性民主”的标准来衡量,土耳其离“新欧洲”对民主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最后,土耳其国内的库尔德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政治势力,不仅对国家的统一构成挑战,而且在国内政治体系中造成严重的紧张局势。^③土耳其未能用和平方式把这些分裂因素纳入国内民主体系,也是它和欧洲关系进展迟缓的重要原因。

冷战结束后,土耳其和欧盟关系的发展依旧是一波三折。1995 年土耳其和欧盟签订关税联盟协议是一个重要转折。但关税联盟并未能推动土耳其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全面改革,结果其欧盟成员国候选国地位在 1997 年卢森堡会议上被取消,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努力遭到严重挫折。两年后,赫尔辛基会议再次确定了土耳其的候选国资格,成为土耳其和欧盟关系发展的里程碑。导致赫尔辛基会议改变卢森堡会议决定的原因很多,其中不乏美国的积极推动作用。赫尔辛基会议后,土耳其政府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政治改革,涉及扩大少数民族文化权利和取消死刑等重要内容。^④土耳其 2000~2001 年初的经济危机进一步冲击了反对改革的势力,加快了改革进程。面对严重的经济危机,加入欧盟可能带来的物质利益前景对土耳其社会表现出更大的吸引力。政治方面,土耳其正义和发展党 2002 年底取得的全面胜利结束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土耳其政府不稳定的联盟政治局面,并且更加积极致力于获得欧盟的成员资格。对于这个政党来说,加入欧盟不再是一个模糊不清的原则,而是一项需要通过持续努力来满足各方要求的具体使命。^⑤同时,温和的伊斯兰政治势力在土耳其取得胜利,也受到了希腊和其他主要欧洲国家的欢迎。另外,土耳其 2002 年 11 月还接受了联合国提出的

解决塞浦路斯争端的《安南计划》。^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该计划不但提供了一种土希两国都可能接受的解决塞浦路斯冲突的方案,而且扫除了土耳其加入欧盟道路上的一个障碍。

在这一系列背景下,2002 年 12 月的哥本哈根会议决定,欧盟将在 2004 年 12 月根据土耳其实施改革的情况,决定和土耳其开始谈判加入欧盟的具体时间。对于急切希望加入欧盟的土耳其来说,哥本哈根首脑会议的结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⑦这意味着,欧盟向土耳其发出了明确信号,确定了和土耳其谈判的时间表。对于土耳其政府来说,有了这样的明确信号后,它不但能够更加坚定地打击国内的民族主义势力和“反对欧盟”联盟,还可以根据《安南计划》的路线来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哥本哈根会议后,土耳其的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对待塞浦路斯的政策发生了急剧变化,《安南计划》在 2003 年初得到了全面贯彻。同时,哥本哈根会议也促使欧盟自身认真考虑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具体问题。面对土耳其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具体改革步骤,欧盟已无法继续把土耳其加入欧盟的问题推迟到遥远的将来,必须认识到这已经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发展和欧洲关系的同时,土耳其与美国的关系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也经历了重要发展。冷战时期,美国为了遏制苏联,把土耳其视为一个

① See Ziya Onis, "An Awkward Partnership: Turkey's Relations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in Comparative-Histor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History*, Vol.7, No.1, 2001, pp.105-119.

② See Heinz Kramer, *A Changing Turkey: The Challenge to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0.

③ Ergun Özbudun, *Contemporary Turkish Politics: Challenges to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0.

④ See Ziya Onis, "Domest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 Norms and Challenges to the State: Turkey-EU Relations in the Post-Helsinki Era," *Turkish Studies*, Vol.4, No.1, 2003, pp.9-35.

⑤ See Ziya Onis and Fuat Keyman, "Turkey at the Polls: A New Path is Emerging,"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14, No.2, April 2003, pp.95-107.

⑥ See Hüseyin Bağcı, "Turkish Reactions to the EU Approach," in *Looking into the Future of Cyprus-EU Relations*, Susanne Baier-Allen (ed.), Baden-Baden: Nomos, 1998, pp.39-50.

⑦ See Mehmet Ugur, "Testing Times in EU-Turkey Relations: The Road to Copenhagen and Beyond," *Journal of Southern Europe and the Balkans*, Vol.5, No.2, August 2003, pp.165-183.

具有关键性战略地位的国家。土耳其不但与美国建立了特殊的战略关系,而且和美国最基本的安全利益直接联系在一起。^① 冷战结束后,海湾危机爆发使美国依然无法忽视土耳其在战略上的重要地位。九一一事件后,土耳其表明的反对恐怖主义的强烈意愿,更突出了它在美国建立冷战后世界新秩序和实行中东战略中的重要地位。^② 相比之下,美国比欧盟更加重视土耳其的重要性。对于欧盟来说,考虑更多的是土耳其加入欧盟可能带来的经济负担和文化差异,而且对土耳其重要性的认识较为模糊和暧昧。对于美国来说,土耳其的重要性明确地表现在安全和当前的全球性反恐方面。正如美国前驻土耳其大使帕雷斯所说:“从安全的前景来说,土耳其军事的作用和冷战时期同样重要。土耳其参与索马里、波斯尼亚、科索沃以及马其顿的维和行动向美国表明,作为一个‘建立安全的国家’,土耳其完全有能力并随时承担起这种责任。”^③

为了使土耳其成为一个可靠的盟国,美国积极支持把土耳其和欧洲的一体化进程联系起来,力图通过欧洲一体化把土耳其纳入西方制度的体系。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美国对土耳其加入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态度非常积极,和欧洲主要大国那种模棱两可的冷淡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实际上,美欧这种区别的根本原因在于,土耳其加入欧盟并不涉及美国的经济利益,而欧洲国家则必须考虑让土耳其加入欧盟的潜在代价,这将涉及共同体的就业前景、预算调整、农业政策和决策程序等一系列问题。^④ 土耳其对于欧盟来说更多的是一种安全负担,而不是安全倚靠。因为土耳其加入欧盟意味着,欧盟在地缘上将和中东这个世界上最不稳定的地区直接连接,这必然会给欧盟带来更多不稳定因素。^⑤ 另外,伊拉克战争爆发前,跨大西洋联盟内部在利益认知方面也有严重分歧。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美国更加关注的是安全问题。而欧盟作为一个区域性组织,关注的主要是民主问题。对于美国来说,土耳其在安全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性要比它在民主方面按照“新欧洲”标准存在的不足更值得重视,因而有必要促使土耳其尽快加入欧盟。^⑥

基于这种考虑,美国对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进程极为关注。欧盟卢森堡会议取消土耳其的候选

国资格后,美国政府进一步支持土耳其加入欧盟。1999年11月,克林顿访问土耳其期间,特别明确地表示了美国支持土耳其加入欧盟的立场。由于美国的巨大影响,欧盟在赫尔辛基会议上改变了卢森堡会议的决定,再次给予土耳其候选国地位。赫尔辛基会议之后,美国还说服土耳其和希腊接受一项解决塞浦路斯长期争端的协议,从而消除了土耳其加入欧盟的一个重要障碍。2001年,当土耳其陷入严重经济危机时,美国总统布什亲自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工作,为土耳其2002年的经济改革计划提供了160亿美元的支持,帮助土耳其渡过难关。^⑦ 此后,随着美国对伊拉克战争的迫近,布什政府对欧洲国家施加了更大的压力,要它们尽快确定土耳其加入欧盟的日期。结果,在2002年12月的哥本哈根会议上,欧盟进一步确定将根据土耳其国内改革的情况决定其入盟谈判的确切日期。

不过,美国推动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努力对于土欧关系也有某种负面影响。一方面,美国的支持导致土耳其的安全和外交政策决策精英们产生这样一种想法,以为土耳其可以不执行哥本哈根会议规定的入盟谈判前必须进行的政治和经济改革要求。他们甚至希望依仗美国支持和土耳其自身战略地位重要性来逃避哥本哈根会议的很多规定。例如,他们对于哥本哈根会议规定的给予国

① F.Stephen Larrabee and Ian O. Lesser, *Turkish Foreign Policy in an Age of Uncertainty*, Santa Monica, CA: RAND Publications, 2003.

② See uhnaz Yilmaz, "Impact of Lobbies on Turkish-American Relations," in *Turkish-American Relation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Mustafa Aydin and Cagri Erhan (eds.), London: Routledge, 2004, pp.181-212.

③ Mark R. Parris, "Starting Over: US-Turkish Relations in the Post-Iraq War Era," *Turkish Policy Quarterly*, Vol.2, No.1, Spring 2003, p.7.

④ See Sabri Sayari, "US and Turkey's EU Membership," Koc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eminar*, December 2002.

⑤ See Barry Buzan and Thomas Diez,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urkey," *Survival*, Vol.41, No.1, Spring 1999, pp.41-57.

⑥ See Bruce Kuniholm, "Turkey's Accession to the European Union: Differences in European and US Attitudes, and Challenges for Turkey," *Turkish Studies*, Vol.2, No.1, Spring 2001, pp.25-53.

⑦ Ziya Onis, "Argentina, IMF and the Limits of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http://home.ku.edu.tr/~zonis/publications.htm>.

内少数民族文化权利问题,就一直极不情愿。按照他们的理解,在土耳其文化背景下给予库尔德人同等的文化权利,势必会对民族国家的统一构成严重威胁。^①另一方面,美国的支持还助长了土耳其国内的“反欧盟联盟”势力。其实,这股势力并非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而是反对加入欧盟所附带的政治和经济条件。同时,构成这股势力的团体更倾向于把“美国—以色列—土耳其轴心”视为土耳其外交政策和安全利益的天然基础。他们甚至提出,应把此轴心作为土耳其加入欧盟之外的另一种战略选择。他们强调,这种选择并不附带像加入欧盟那样必须满足的一系列条件,且更有利于突出土耳其的战略地位。^②

伊拉克战争

对土耳其与美欧关系的影响

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土耳其对外关系主要建立在维持与美国的传统联盟关系,并争取早日加入欧盟这两大具体目标的基础上。在这两者之间,土耳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基本上保持了一种以土美关系促进土欧关系的趋势。伊拉克战争爆发打破了这种平衡。土美关系由于土耳其议会拒绝美军假道进攻伊拉克而陷入困境,从而使土耳其不得不放弃依赖美国而更多地倒向欧洲,并更加积极地按照哥本哈根会议标准在国内展开经济和民主化改革的进程。这种变化的根源主要是,1999 年赫尔辛基会议决定给予土耳其候选国地位以后,土耳其国内的欧洲化倾向愈加强烈。这次会议后,来自欧盟的一系列明确信号也进一步促进了土耳其在民主和经济方面从程序性调整转向实质性改革,并使得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和欧洲大国更加接近,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开始欧洲化。

美国方面,九一一事件使美国的安全心理受到严重打击。在美国公众的支持下,布什政府决心展开一场世界范围的反恐行动来维护美国安全。但美国的欧洲盟国对于美国采取这些行动的方式、途径及目标的理解有很大分歧,这种分歧随着 2003 年初伊拉克危机的加剧而达到顶点。结果,美国对伊拉克采取的军事行动不但加剧了跨大西洋联盟的分歧,而且导致了欧盟内部的分裂。以法、德为核心的联盟坚决反对美国的军事

行动,而英国、西班牙和波兰等则支持美国。

战争爆发前,美国对土耳其寄托了很大希望。一方面,美国希望在这个穆斯林占主体的世俗化民主国家建立一个成功的“土耳其模式”,为中东其他穆斯林国家树立一个民主化的榜样。另一方面,美国还要依靠土耳其的充分合作来推翻萨达姆政权,美国指望可以使用土耳其的领土和领空从北部打击伊拉克。为了换取土耳其的帮助,美国在战争爆发前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来推进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进程,特别是在 2002 年哥本哈根会议前,布什政府对欧洲领导人施加了巨大压力。当时,美国政府从未怀疑过土耳其会在战争中与美国进行全面合作。土耳其除了在加入欧盟问题上需要美国支持外,还深陷于经济危机中,直接或间接依赖于美国的财政援助。另外,土耳其面临的塞浦路斯问题和修建巴库—吉罕输油管道工程,也需要得到美国支持。然而,美国政府却忽略了土耳其国内存在的问题,其中包括土耳其人对海湾战争后美国未能兑现的政治和经济承诺的强烈不满、国内主要政治势力之间的分歧、正义与发展党缺乏执政经验而且内部不和、美土两国在如何处理伊拉克北部地区问题上的争执等。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土耳其议会于 2003 年 3 月 1 日决定不让美军在伊拉克战争中使用土耳其领土,从而使美土关系顿时陷入僵局。

当土美关系在伊拉克问题上陷入困境时,土耳其和欧盟的关系却有明显进展。欧盟一些主要大国的政治家原认为土耳其过于亲美,担心它加入欧盟后会成为一匹“特洛伊木马”。但土耳其议会于 2003 年 3 月 1 日做出的决定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法、德等欧盟主要大国对土耳其的成见,因而对土耳其加入欧盟表现出更积极的态度。

在土耳其国内,土美关系的困境也促使土耳其政府必须更大程度地推动改革进程来满足欧盟提出的要求,并向公众强调土耳其加强和欧洲关系的重要性。同时,在土美关系出现问题的负面

① Onur Öymen, *Turkey's chief representative at NATO, Turkish Challenge: Turkey, Europe and the World Towards the 21st Century*, Cambridge: Rustem, 2000.

② See Ihsan Dagı, "Competing Strategies for Turkey: Eurasianism or Europeanism?" *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Analyst*, May 8, 2002.

影响下,土耳其国内的“反欧盟联盟”势力受到严重打击。“反欧盟联盟”提出的“土耳其—美国—以色列安全三角”的想法,也颇受怀疑。这些情况表明,土耳其政府在土美关系恶化后已经明确认识到,如果不能尽快发展和欧盟关系的话,就会陷入彻底孤立。为此,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府从2003年开始按照欧盟的要求在国内进行了全面的政治和经济改革。

在这些改革措施中,最重要的是土耳其议会2003年8月8日批准了根据哥本哈根标准制定的《第七次调整方案》。方案规定,土耳其政府要认真处理文职官员和军队的关系,并对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委员会内部文职人员和军人之间的关系进行调整。改革计划还要求限制军人在政治中的作用,减少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行政权力,增加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中文职人员的比例,并把军队的开支置于“会计法庭”的监督之下。^①这些改革减少了土耳其国内军队对政治的干预,因而受到了欧洲国家的普遍欢迎。为了达到哥本哈根会议提出的政治标准,土耳其议会2004年5月7日还提出了一系列宪法修正案。这些修正案涉及土耳其国内的很多具体问题,包括司法改革、出版自由、文人政府和军队关系和男女平等。其中废除国家安全法庭和撤消国家安全委员会在高等教育部门代表的行动,尤其得到了欧洲国家的关注。在这些措施面前,土耳其国内“反欧盟联盟”的势力逐渐衰落。土耳其军队和安全部门也开始放弃强硬路线,主动采取与欧洲主要国家更加一致的立场。在土耳其政府积极改革的同时,欧盟也向土耳其发出了更加明确的信号。2004年12月欧盟首脑会议把2005年10月3日确定为土耳其入盟的谈判日期,可以说是土欧关系在伊拉克战争影响下迈出的最重要的一步。

伊拉克战争后 土耳其调整与美欧的关系

伊拉克战争爆发后,尽管土耳其与欧盟的关系在短期内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土耳其政府也很清楚,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土耳其未来依然很难顺利平稳地加入欧盟。尽管2004年12月的欧盟首脑会议已确定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谈判日

期,但在土耳其最后成为欧盟成员国的过程中,仍有很多困难和不确定因素。在此过程中,获得美国的积极支持对于土耳其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土耳其政府也看到,尽管伊拉克战争加深了跨大西洋联盟的分歧,挫伤了土美关系,但土、欧、美三方依然存在着重建三边关系的乐观前景。因为三方都认识到,在承认其分歧的同时,应该重视维持其传统三边合作关系的重要性。对于如何调整跨大西洋联盟的结构关系虽然争议颇多,但其发展前景依然颇为乐观。在学术界,以罗伯特·卡根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在美国和欧洲之间出现了一种严重的权力和意识形态隔阂。“欧洲已进入后历史时代那种和平与相对繁荣的乐园,实现了康德所说的那种‘永久和平’。而美国则依然在历史中徘徊,在霍布斯所描述的无政府状态的世界中追逐着权力。在那里,国际法和国际规则都不可依靠,安全、防卫和对自由主义秩序的维护,依然需要拥有和使用武力。”^②以菲力普·戈敦为代表的另一些美国学者则强调,“尽管美国和欧洲之间有重大分歧,但其核心价值观和利益并无差异。造成这些分歧的原因,主要是布什政府近年来所采取的极端政策。”^③另一位美国学者爱沃·达德尔也认为,伊拉克战争后美国的中东政策已到一转折点,如果美国努力合作和采取相互支持的政策来重建伊拉克,以及稳定和改造中东,就能够恢复这种已经遭到损害的关系;但如果美国依然决心独自行事,就会把这种关系推向危险的边缘。^④

事实上,伊拉克战争后,土—欧—美三边关系已经出现某些松动和乐观的迹象。一方面,欧盟内部存在很大分歧,在不断扩大的欧盟成员国中,很多老的和新的成员国都支持美国。另一方面,法、德核心虽然反对战争,但同样强烈谴责萨达姆政权,并对战后重建伊拉克深感兴趣。对

① Paket Devrimi, “Revolutionary 7th Reform Package”, *Hürriyet*, July 3, 2003.

② Robert Kagan, *Paradise and Power: America and Europe in the New World Order*, London: Atlantic Books, 2003, pp.3, 97.

③ See Philip H. Gordon, “Bridging the Atlantic Divide,” *Foreign Affairs*, Vol.82, No.1, January/February 2003, p.74.

④ See Ivo H. Daalder, “The End of Atlanticism,” *Survival*, Vol.45, No.2, Summer 2003, pp.147-166.

美国来说,尽管它拥有绝对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但也越来越认识到单边主义行动无法在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取得长期和平与稳定。由于占领花费的人力和财政代价过于庞大,布什政府越来越感到需要寻求国际合作来进行伊拉克重建。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对土耳其的态度也有了明显变化,从而使得两国间的紧张气氛有所缓解。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美国要求土耳其参加在伊拉克的维和行动,就是这种变化的一个明确表现。2003 年 10 月,土耳其议会批准向伊拉克派遣维和部队,就是为修复土美关系迈出的重要一步。尽管伊拉克管理委员会坚决反对接受土耳其军队,从而使得这一行动依然无法实施,但即使最终不能在伊拉克部署军队,土耳其的善意姿态也会给美国政府造成一种积极的印象。

从目前情况看,重建土美关系的关键是要恢复双方的相互信任。土美关系恶化后,美国对土耳其加入欧盟的支持明显减弱。同时,土耳其政府和军事部门对于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战略目标深感担忧。他们坚决反对建立一个联邦制的伊拉克,担心在伊拉克北部地区出现一个独立的或联合的库尔德人国家。土耳其公众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后也出现了强烈的反美情绪。土耳其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公众对美国持友好态度的比例已从 2000 年的 52% 下降到 2003 年 3 月的 12%,调查还表明伊拉克战争后 83% 的土耳其人对美国人的印象是负面的。^① 土耳其的《拉迪卡尔报》(Radikal) 评论员阿卡塔甚至提出:“从现在开始,土耳其人应该从我们和美国关系的困境中摆脱出来,把欧盟作为我们唯一的目标。”^② 对于这种情况,美国前驻土耳其大使派雷斯指出,双方应当“重新建立相互信任和包容,以及有效的沟通途径。这曾使得土耳其人和美国人在过去 60 多年友谊与联盟的基础上,共同成功地面对各种挑战。作为一个新的开端,这也是双方领导人目前首先要做的事情。”^③

在努力恢复与美国关系的同时,土耳其还要继续发展与欧盟的关系,以维持土美与土欧关系新的平衡。其中最重要的即土耳其要继续以最快的速度推进与欧盟相关的改革并推动其经济发展。哥本哈根会议曾明确提出,土耳其不但要有进行改革的意愿,还要采取适当的实施步骤。另

外,土耳其还要按照《安南计划》,采取务实的政策来解决塞浦路斯争端。尽管这个计划有其缺点,但它至少提供了一个在欧洲框架内解决塞浦路斯长期争端的现实机会。从目前来看,在土耳其和土耳其裔塞浦路斯人政府表达了要统一全岛的政治意愿之后,土耳其在塞浦路斯问题上面临的压力有所减缓。

总的来说,土耳其与美国、欧盟关系的未来发展,将更加重视两者的平衡和相互促进。如果单方面强调发展与美国或是欧盟的关系,对土耳其来说都不是一种可行的选择。同时,土耳其还明确认识到,发展和美欧任何一方的关系,都应促进与另一方关系的发展。尽管这种相互促进的性质和范围还取决于跨大西洋两岸关系的微妙变化,但无论如何,土耳其和欧盟关系的深化,必然有助于土耳其和美国关系的恢复发展。而土美关系的恢复又会促使美国对欧盟施加更大的影响来推动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进程。这不但符合土耳其的国家利益,而且将使土耳其能够作为一个地区大国在中东地区发挥更大的影响。在当前这个关键时期,正在出现各种建构中东未来、欧亚关系,以及跨大西洋关系的路线图。对于土耳其来说,尤为重要的就是准确评估国际社会这种持续的剧烈变化,并同时加强发展和美国、欧盟的关系,而不是以牺牲与一方关系的代价来发展和另一方的关系。与此同时,美国和欧盟也会意识到,任何一方如果孤立或放弃土耳其,都将对自己造成巨大损失。作为一个穆斯林占主体的世俗化国家,土耳其将能够在这个对于美国和欧洲利益都至关重要的不稳定地区发挥重要的作用。对于土耳其自身来说,如果能够顺利地成为欧盟成员国,并且和美国进行密切合作,就能在这个地区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

(责任编辑:吴传华 责任校对:邢永平)

① Türkiye'ye Askeri Tehdit, "US as a Military Threat to Turkey", *Hürriyet*, June 4, 2003.

② Rota Avrupa'ya Dönmeli, "Turkey Should Direct its Course to Europe", *Radikal*, August 7, 2003.

③ Mark R. Parris, "Starting Over: US-Turkish Relations in the Post-Iraq War Era," *Turkish Policy Quarterly*, Vol.2, No.1, Spring 2003, p.7.